一、中共有關「中國式現代化」論述觀察

致理科技大學國貿系副教授張弘遠主稿

- **習近平對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講話定調，必須堅持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並將過去十年歸功於中共成功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突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地位。**
- **鄧小平改革開放後，中共的現代化歷程融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及允許社會具有部分自由主義思想。習近平強調中國夢、民族復興，擘劃全方位現代化、超趕式文明進化，「以黨領政」模式或是中共超越西方經驗的關鍵；但黨國界線模糊化，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領域恐陷入相互擾動的循環當中。**

（一）習時期的中國現代化意涵

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概念是習近平在「十九屆六中全會」所提出的施政主軸，主要用以回應：「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等兩個根本的政治問題，一方面是想要回答外界對於習近平主政下中國往何處去的質疑；另一方面則是中共反思中國特殊之國情而欲選擇相適合的發展道路。

中國社會是一個從農業轉換至工業的社會，而中共的改革開放則是推動整體社會變遷進入當代文明的重要舉措，然而農業社會的底蘊、龐大的人口規模，再加上各國對於中國崛起的擔憂，構成了中共推動現代化時所可能遭遇的挑戰。而隨著中共新一輪高層權力接班展開，如何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又浮上政治檯面。在 2022 年 7 月 27 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二十大」專題研討班上，強調「我們推進的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堅持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鑑於即將召開「二十大」，故而這次講話內容也被外界認為是解讀習近平對於中共政治任務重要機會。

中共律定自身政治任務時，往往是從當前的形勢加以分析，而在本次講話中，習近平分析「十九大」之後中國所面對的情勢以「極不尋常」、「極不平凡」八字來加以概括，而這也是中共處理「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等兩個內外局勢之後所產生的感想。對內，習近平認為中國以人民戰爭的方式來抗擊疫情，以強化中央管制權力的作法把握香港大局；對外，則是維護國家尊嚴與核心利益並與對手展開鬥爭。而中共目前面臨到四大考驗：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而這四項考驗也將長期存在，而總結當前的情勢之後，習近平替過去十年定下基調：中共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路徑

何謂中國式的現代化？習近平的答案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而這個現代化的終極目標則是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那麼要如何落實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共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了戰略部署，基本上是分兩步走：從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 2035 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在落實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工作上，習近平提示工作重點：未來 5 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搞好這 5 年的發展對於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至關重要，要緊緊抓住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而實現任務的關鍵則是在：「黨」。既然黨的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成功的樞紐，也因此，習近平要求全黨深刻認識可能危及黨的領導的因素，也就是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四大危險，因此習近平把推進中國現代化的論述重點與從嚴治黨、黨的自我革命等黨建工作相互聯繫一起。

習近平的發言重點是放在中國式現代化，並以此作為中共長期執政的合法性來源，然而各界對於本次演講的學習重點反而都是以「兩個確立」為中心，也就是強化對於習近平的領導權威的擁護。何以中共各界會把中國式現

代化與確立習近平領導權威這兩件事情當作連結關鍵？理解這一點應該就能掌握中國式現代化的主要特色。

（三）西方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比較

現代化往往是指涉社會變遷的現象，從原先傳統、封建與農業的社會形態，因為經濟上的工業化而推動社會的城市化，進而帶動政治民主自由的發展。由於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帶動技術創新的需要，進而也促使理性客觀與個人主義的價值發展，最終建構出一個迥異於前工業社會的文明樣貌與社會結構。這種現代化歷程主要是以西歐國家的歷史作為發展平台，而西方文明也因為現代化的成果而成為其他世界或文明體系借鏡取法的對象。然而這種結合工業資本、民主自由、個人主體等價值的社會體系以及所相適應的政治制度，在他國進行制度複製時無法一蹴可幾，必需先與該國社會主流價值與社會結構相互磨合，並設法在控制制度變遷成本的情況下建構制度轉型路徑來完成現代化。

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可以從五四運動開始溯源，民主與科學作為當時中國現代化啟蒙的主要價值，在背後所想要解決的則是落後的國家處境，但長期封建與封閉的中國社會想要成功銜接西方現代化的路徑並不容易，無論是梁啟超的憲政主義或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雖然都是立足於當時中國國情，但卻無法有力的化解外部的挑戰，最終中共則以列寧式共產主義作為思想核心而獲得主導國家發展的機會。然而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與列寧式共產主義並不相容，因此在毛澤東時期，中共主導的現代化結果便是重度摧殘傳統社會文化，雖然名義上共產主義成為中國的主導性思想，但實際上並未催生具有現代化意義的社會制度轉型。

在鄧小平改革之後，中國開始重新自經濟層面來再次推動現代化歷程，鄧小平的作法基本上是在經濟上推動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社會上則是有限度的允許自由主義思想，但在政治制度上則仍強調群體主義與中共權威，對此，吾人稱之為中國式「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由於這套作法主張經濟利潤需要與社會共享，而利潤分配則可透過市場或政府來完成，但

中共則將自身置於絕對主導的高度；換言之，中國式市場社會主義被侷限在經濟或社會層面，而政治資本的分配與運用仍是由中共作主。

然而這個現代化的作法在習近平時期又出現了轉折，習近平強調中國夢、民族復興，故而其所擘劃的現代化就不會只有經濟結構的現代化，而是一種全方位的現代化，是一種超趕式的文明進化，但又不能重複西方現代化的旅程，特別是在政治層面上的民主自由與個人主義，這將與中共政黨屬性與權力結構有著根本性的衝突。

雖然在經濟與社會的結構上，中國現代化有著明顯的西方進程身影，但在政治現代化上則採取抽換概念的作法，中共提出「人民民主」或「以人為本」的典範，想要以此與西方現代化做出區隔，並保留了中共永續執政的思想準備。在這個架構中，中共必須證明在頂層設計上的這套獨特作法，可以在經濟、社會或科技等結構上超越西方經驗，既可以擁有如西方社會的「現代性」特徵，又能夠從不同發展模式中達成更好的結果，如何確保這個預言的實現？對此，中國共產黨「以黨領政」的模式便成為答案。

（四）結論

中國式現代化的問題有二：一是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路徑設計；二是現代化所欲建構的現代性內涵。從列寧式共產主義到市場社會主義，中共推動中國現代化是以社會主義為架構，這與西方現代化建構在資本主義路徑有所差異，自然在領導現代化的動力結構上也不相同。列寧式共產主義將推動的責任交付給先鋒性政黨，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則主要是由資產階級或統制階級來推動。中共所欲推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在建政初期，毛澤東曾經採取階級鬥爭的策略，例如發動無產階級鬥爭資產階級來沒收生產工具、生產資料，但此舉造成極為嚴重的社會矛衝突，最終撕裂中國社會的發展共識。這個痛苦經驗讓中共領導人在改革開放之後，謹慎地處理階級衝突，例如全力「維穩」、重視「三農」，到了習近平時期便引發再分配與三次分配的討論，但如何透過政策分配來調和經濟成長之後的貧富差距？如何確保國家不至於掠奪民間發展成果，又如何避免貪腐與政商尋租？

西方現代化過程所引發之社會矛盾，主要是依賴制度性安排（如司法、社福）來進行化解，但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矛盾則依賴政黨調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如此一來，黨與國的邊界逐漸整合，黨政中樞的角色更為吃重，故而在習近平的執政設想之中，黨便是國家現代化發展所有問題的答案。但這種強化政黨角色的作法框限政治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政治議題與改革進程被強制鎖定在現存位置，並不得妄議。故而讓習近平主政之下的中國式現代化內涵被侷限在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層面，政治領域無法與經濟、社會相適應的有機發展，而在其他領域當中，過度延伸中共政治主導的角色，最終也導致此一模式的侷限性，進而造成中國式現代化將不斷的在政治與經濟、政治與社會等領域陷入相互擾動的循環當中。

二、中共「二十大」會前高層人事預測

中共研究雜誌社特約研究員吳仁傑主稿

- **依照「七上八下」年齡規範和兩屆 10 年任期限制，中共政治局或有常委 3 名、委員 9 名卸任，已任副職或在準「入局」職務歷練的何立峰、孟祥鋒、李書磊、陳一新、楊曉超、楊振武、肖捷、苗華、李檮銘或林向陽等晉級機會較大，亦凸顯實權單位秘書長政治份量明顯上升。**
- **中共外事領導或由現行「2 副國級、1 正部級」，恢復為「1 副國級、2 正部級」，國務委員兼外事辦主任人選以劉結一、外長馬朝旭出任機率高，搭配已就任的中聯部長劉建超。另劉海星為國臺辦主任黑馬人選。**

（一）前言

中共預於 10 月 16 日起舉行為期一週的第 20 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二十大」），選舉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二十大」閉幕隔天（預估 10 月 23 日）第 20 屆中央委員會隨即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即「二十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軍委）等中央高層領導班子。由於 2017 年 10 月「十九屆一中全會」未安排接班人，且 2018 年 3 月 13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使黨政軍「三位一體」體制下兼任國家主席的總書記習近平續任已無懸念。 惟下任總理人選、接班人會否浮現等仍引發高度關注，本文主要將圍繞下屆中央政治局等副國級領導，以及外事、涉臺系統主要領導人選等進行預測，藉供參考。

（二）本屆去留情況

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屆一中全會」雖主要選出或決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等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但同時會對政權系統主要領導進行統籌研究並提出安排建議，依照「七上八下」年齡規範和政權系統領導兩屆 10 年任期限制，須屆退者如下：

1.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19 屆 7 名政治局常委，除 69 歲的總書記習近平續任無疑，其他 6 名以「七上八下」年齡限制為判準，1955 年以前出生者滿 68 歲須卸任，包括：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韓正。另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因已任兩屆須卸職，而依照中央政治局常委「有限任期制」規範，其扣除接班培養歷練階段不計，擔任常委也已兩屆 10 年，故雖為 1955 年出生，但因任期制約，屆時卸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職務機會頗大。綜上顯示最多將有 3 名 19 屆政治局常委卸任。

2. 中央政治局

19 屆 25 名中央政治局委員，扣除前述 7 名常委還有 18 名；其中，年齡屆滿 68 歲須卸任者包括：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中央組織部長陳希、中紀委副書記兼國家監委主任楊曉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中央外辦主任楊潔篪、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女）、全國人大排名第一副委員長王晨、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和張又俠等 9 名。另胡春華已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兩屆 10 年，若未晉升常委亦應卸下政治局委員職務。

3. 其他副國級領導

在中央書記處和國務委員方面，非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僅中央統戰部長尤權 1 名，因年滿 68 歲須卸任；5 名國務委員中，魏鳳和、王毅、趙克志等 3 名屆滿 68 歲要退下，王勇已任兩屆 10 年不能續任，故至少替換 4 名。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秘書長方面，中共黨籍副委員長張春賢、吉炳軒、艾力更・依明巴海（維吾爾族）、白瑪赤林（藏族）等 4 名年逾 68 歲須卸任，副委員長兼全國婦聯主席沈躍躍（女）任滿兩屆 10 年不能連任，是以至少 5 名會異動。在全國政協副主席方面，中共黨籍副主席中至少有張慶黎、劉奇葆、盧展工、馬飆（壯族）、夏寶龍、楊傳堂、李斌（女）等 7 名因年齡因素將屆退。另在「兩院」方面，最高法院院長周強任滿兩屆 10 年無法續任。

此外，在中央軍委方面，「2 副 4 委員」組成的 6 名軍職成員中，除上述 2 名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的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和張又俠、兼任國務委員

兼國防部長的軍委委員魏鳳和將屆退外，軍委委員兼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也因年齡因素無法續任。

（三）下屆可能人選研判

在副國級領導中，依照年齡和任期限制可推測須屆退（或轉任）者，然研判新任者難度相對較高，謹嘗試針對外界較關注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以及部份其他副國級領導接替人選進行論述如下：

1. 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委員空缺將由正省部級、正戰區級或其他副國級領導調升，19 屆 25 名委員中有 9 名將屆退，至多約 3 名升任常委，至少 1 名未屆齡者可能不再連任（前新疆區委書記陳全國），故下屆將有約 13 名空缺，可能人選有：

（1）中紀委第 1 副書記兼國家監委主任楊曉渡屆退，中紀委副書記兼秘書長楊曉超有機會接任。另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副書記兼國務委員趙克志均將屆退，郭聲琨的接替人選以習近平任上快速調升並屢獲委以重任的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較具優勢。

（2）孟祥鋒 2020 年調任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由於該職多係為歷練中央辦公廳主任接班人選時設立，若無意外將接替丁薛祥升任中央辦公廳主任。

（3）全國人大排名第一副委員長王晨屆退，因近兩屆都由相對熟稔全國人大議事運作的前一屆全國人大秘書長升任，加上楊振武為習近平河北任職時舊識，由其順勢接替王晨可能性大。

（4）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和孫春蘭（女）將屆退、胡春華可能調升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劉鶴空缺無疑將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接替，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也有一定上位優勢，另女性代表以貴州省委書記譚賁琴或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沈躍躍機會較大。

（5）2 名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張又俠屆退，可連任的軍委委員兼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將佔一席，另一席以前北部戰區司令員李橋銘機會最

高，但近期職務被取代後潛藏不確定性，若其出局，則以東部戰區司令員林向陽較有可能。

（6）在地方方面，2021 年底出任新疆區委書記的馬興瑞晉升應已明確。另 2022 年任正省部級領導將滿 15 年的湖南省委書記張慶偉，被視為「之江新軍」成員、具有兩個省級黨委書記歷練的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軍工系統出身且相對資深的遼寧省委書記張國清，以及系出「清華」的北京市長陳吉寧、具「之江新軍」色彩的上海市長龔正等，也有機會成為下屆黨和國家領導人，其中約 2-4 名有機會「入局」。

2. 中央軍委

下屆中央軍委若維持本屆「2 副 4 委員」配置，如前所述，其中排名第二副主席將由軍委委員兼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接替，其遺缺由軍委委員兼軍委紀委書記張升民繼任，張員空缺以陸軍出身的火箭軍政委徐忠波或空軍政委郭普校調升可能性較高。另排名第一副主席接替人選仍以原北部戰區司令員李橋銘機會較大，若未然，則東部戰區司令員林向陽將是「黑馬」。

其餘兼任國防部長、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的 2 名軍委委員空缺，將由軍事將領升任，若軍委副主席由李橋銘出任，則以空軍司令員常丁求和林向陽機會較大；若是林向陽調升軍委副主席，則常丁求和陸軍司令員劉振立、南部戰區司令員王秀斌都有可能。

3. 其他副國級領導

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統戰部長空缺，料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陳小江或較資深省級黨委書記（如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等）出任。5 名國務委員至少有 4 名缺額，約略可推斷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國務委員兼中央外辦主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分別由空軍司令員常丁求、中央臺辦主任劉結一、 公安部長王小洪升任機會較大。

「兩院」主要領導人選已相對明朗，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張軍料接替無法續任的周強任最高法院院長，遺缺由近期獲任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的原湖北省委書記應勇升任。

在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方面，因為空缺人數多、研判難度高。五個主要少數民族（維吾爾族、藏族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其他三個係全國政

協副主席）有維吾爾族、藏族和壯族各 1 個缺額，前兩者一般由區人大主任調升、後者由區政府主席升任。因此新疆區人大主任蕭開提・依明、西藏區人大主任洛桑江村和廣西區政府主席藍天立應會依例接替。另已任兩屆現職無法續任的周強和王勇可能不再連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全國，有頗大機會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此外，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全國婦聯主席沈躍躍若調升中央政治局委員，遺缺以譚貽琴繼任可能性高；若未然，則全國婦聯書記處第一書記兼副主席黃曉薇具順勢升任優勢。

4. 外事和涉臺主要領導

如前析述，由於楊潔篪、王毅因年齡因素無法續任，若無意外，中共外事系統主要領導人事將由現今「2 副國級、1 正部級」，恢復為此前的「1 副國級、2 正部級」配置，即國務委員兼中央外辦主任，搭配外交部長、中央對外聯絡部長；其中，後者已率先由劉建超出任，國務委員兼中央外辦主任料由中央臺辦主任劉結一調升。至於外長人選，原以常務副外長樂玉成最被看好，但其在年中調離外事系統後已無可能，亦打亂原先規劃的人事安排，後續可能接替人選將從 1962 年（含）以後出生的資深副外長，或曾任副外長的駐外大使中拔擢，人選包括：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駐英國大使鄭澤光、駐俄羅斯大使張漢暉、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長羅照輝等。另中央臺辦主任接替者，應還是會由外事系統領導調任，亦是以 1962 年（含）以後出生者機會較大，人選除上列 4 名外，外交部出身，7 月被明確為正部級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劉海星可能是「黑馬」。

（四）結語

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屆一中全會」將在 10 月中旬起舉行，攸關高層領導新老交替的組織籌備工作正處於收尾階段，9 月下旬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不會即時通報概況）審查後基本底定。其中，總書記習近平雖已 69 歲，但主導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且尚未安排接班人選，故其在「二十大」後續任「三位一體」最高領導人已無懸念。

中央政治局委員約有 13 名缺額，以中紀委副書記兼秘書長楊曉超、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孟祥鋒、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全國人大秘書長楊振武、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貴州省委書記譚賄琴、軍委委員兼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新疆區委書記馬興瑞、原北部戰區司令員李橋銘（或東部戰區司令員林向陽）機會較大。若然，亦凸顯各大實權單位秘書長政治份量明顯上升。

中央軍委 4 名委員人選，軍委委員兼政治工作部主任料由軍委委員兼紀委書記張升民出任，火箭軍政委徐忠波或空軍政委郭普校接替張員空缺。另空軍司令員常丁求、東部戰區司令員林向陽、陸軍司令員劉振立或南部戰區司令員王秀斌，有機會出任軍委委員兼國防部長、軍委委員兼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整體人事配置基本會考量軍種平衡。

歷經 2012 年「十八大」迄至 2022 年「二十大」，習近平權力不但更為穩固，且早已掌控全局，尤其二十屆中央高層領導中親信舊屬或獲其認可人選佔比將更甚往屆，使其決策影響力達前所未有高度，雖有助其意志貫徹和政策落實，但亦潛藏獨斷專行以至決策失誤或濫權危機。

此外，「十九屆一中全會」未循往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納入下世代接班人選，加上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習近平繼續連任鋪路，凡此均改變 1990 年代以來逐漸形塑的接班培養和最高領導人交、接班模式，總書記接班人何時出線，端視習將再續任一屆 5 年或兩屆 10 年而定。若是前者，則接班人以與習相差剛好 10 歲的胡春華機會最大，若然其將在「二十屆一中全會」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其後再相繼出任國家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進行黨政軍全面接班培養歷練。若是後者，則「二十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還不會出現接班人，應留意二十屆中央政治局是否出現「65 後」，以及「二十大」後首位升任正省部級領導的「70 後」。

三、中共「二十大」報告重要政策預測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特約研究員郭瑞華主稿

- **中共同一領導人報告相似度高，習近平「二十大」報告或有新政策措施，但基本在政策延續「十九大」，鞏固現有的成果，而非追求新方向。**
- **習近平對外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等主張，意圖凸顯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 **中共持續營造對臺促統氛圍，「二十大」後促統力度勢將強化，惟恐引起臺灣內部強烈反彈，兩岸「敵意螺旋」續升為其對臺政策挑戰。**

（一）會議主題

在中共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政治體制之下，每五年舉行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決定中共理論、方針、政策及人事的一項重要會議。有關中共今（2022）年 10 月 16 日召開黨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下稱「二十大」），除了聚焦領導階層人事布局，同時也關切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報告。該報告旨在總結過去政績，宣示新的思想、政治和組織路線，是未來 5 年中共黨政部門的政策指導文件。中共「二十大」召開的背景，正逢中共剛過建黨百年、迎接另一個百年目標，同時在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卻面臨外部對「中國威脅」的擔憂，也是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尚難遏止，以及俄烏戰爭尚難結束，全球經濟面臨通貨膨脹與衰退之際。上述種種，習近平如何迎戰和克服，外界正拭目以待。在會議召開前，本文先期預判可能政策方向內容，以期機先掌握未來政策動向，提早因應。

2017 年 10 月，中共十九大會議主題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鬥」。預判本次「二十大」會議主題為「高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

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二）重要政策可能內容

在黨建與政治方面。針對黨的建設，報告將賡續指明，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力保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重申全面從嚴治黨，以及黨的自我革命，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未來黨管一切勢必更為徹底；同時，報告將強調積極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習近平於 2019 年提出中共「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此後，「全過程人民民主」一詞，成為中共宣揚新時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點。中共表明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但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該由少數國家評斷何謂民主；同時提出民主的標準，強調「全過程人民民主」也是實現民主價值的一種方式。顯示中共目的在與西方爭奪民主的話語權，然而全過程人民民主價值的內涵為何？恐需有更多的實例說明。

在經濟方面。報告將強調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促進「共同富裕」，推進科技自立自強。由於中共正承受因美中競爭、新冠疫情、俄烏戰爭引發的經濟發展遲滯甚至倒退，所帶來的內外壓力，眼前必須提出更積極的作為，應對內外在的壓力，以減少外部依賴。同時為消除外資疑慮，中共仍將重申持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不會緊縮，更不會有閉關自守情事。此外，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達成第二個百年目標，促進「共同富裕」成為經濟建設工作的重點。為實現「共同富裕」，不僅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也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其中可能提出的因應對策，主要有稅制改革及資本監管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網路科技巨頭的壟斷問題，習近平強調「強化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引起是否反資本的質疑與擔憂。如何充分發揮資本在推動市場的積極作用，又要防止資本的無序擴張，將是中共經濟治理的重要考驗。

在社會方面。報告將強調持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完善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織密社會保障安全網。中共已完成習近平念茲在茲的脫貧攻堅任務，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共同富裕」將是中共第二個百年追求的目標。然而除了擴大收入、改善民生，如何建構效率、公平兼具的收入分配體系，以拉近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與發展成果之間的距離，不僅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

在文化方面。報告將繼續倡導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及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論述。事實上，在習近平「四個自信」的論述下，中共文化自信明顯增強，不僅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同時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文化強國。另在意識形態領域，則將嚴緊嚴抓，強調鬥爭，希望提升人民對共產黨、中華民族的認同感、自豪感，不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尤其中共認為「網路已經成為輿論鬥爭主戰場」；因此，管制措施勢將層層加碼。至於官方意識形態，對中共而言，「舉甚麼旗、走甚麼路」意義重大，必須明確表態，因此強調將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在軍事方面。報告將強調為實現中國夢、強軍夢，制定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重申共軍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為建設世界一流軍隊；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興軍、依法治軍。同時，面對美國加大對中共施壓，以及美軍在臺海和南海增加活動頻率，報告中對外在環境可能變局，勢必直接回應，強調全面加強練兵備戰，提高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戰略能力。

在對外方面。面對習近平所謂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新的動盪變革期，中共將繼續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也將重申習近平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宣導構建全球發展共同體和全球安全共同體，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目標。同時，也將積極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保護生態環境、應對氣候變化，展現負責任大國形象。面對全球新冠疫情，則將

表明「維護國際社會團結抗疫大局，完善全球公共衛生治理，共築多重抗疫防線，形成應對大流行的國際合力」。此外，習近平推動的「一帶一路」雖然屢受外界抨擊，但報告中仍將盛讚其成功之處，繼續推動共建。對此，吾人不能僅看其對合作國家的剝削面，還要觀察其產生的效益與影響。另外，隨著美中戰略競爭的加劇，中共的對外政策恐會更加強硬。

在臺港澳方面。受到近年美國強力支持臺灣，以及俄烏戰爭影響，顯然報告中將強調臺灣問題不容外力干涉，以及強化兩岸和平統一內涵。報告首先表明「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繼續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策略，「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促進兩岸融合發展。也要反對臺獨分裂，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最後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全體中國人共同的夢想」。面對香港、澳門問題，中共勢必強調在香港治理上的「政績」，表明在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上，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依照憲法和基本法有效實施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制定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牢牢把握香港大局」，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治澳」。

（三）未來發展

由於中共「二十大」報告主要著重未來五年政策方向規劃，甚至著眼於更為長遠的第二個百年戰略目標，都是宏大敘事。同時中共的政策一般都具有延續性，不太可能驟然改變。根據香港學者研究，同一領導人所做的報告相似度都很高，「十九大」報告是由習近平一手掌控，預期「二十大」上，習近平報告的政策內涵仍將是延續而非變化；雖然可能有新的政策措施，但基本上是在鞏固現有的成果，而非追求新的方向。

對內而言，維持一定的經濟成長，以及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是中共獲取統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然而，過去的經濟高速增長已不可得，如今又受

到美中競爭、新冠疫情、俄烏戰爭，以及全球經濟衰退影響，中國大陸經濟明顯下滑，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特別是「動態清零」防疫政策，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影響，嚴苛的防疫政策在各地引發民怨，抗疫成效與付出的經濟社會成本不成比例，也讓防疫政策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當初，中共將防疫成效與政治制度結合，宣揚制度優越性；如今，「動態清零」政策已不可持續，如何有序地退場是其當務之急。

對外而言，隨著美中關係矛盾的逐步全面激化，中共面對的外部挑戰不斷增加，中共在俄烏戰爭不選邊的結果，引起西方的疑慮，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抵制、圍堵，恐將越來越明顯。然而，當各國對中共顯露疑慮之際，習近平相繼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等主張，意圖凸顯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但問題並不是習近平提出什麼主張，而是中共要怎麼做。

另就中共對臺政策觀察，「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積極促進兩岸融合發展，仍將是政策主軸，惟中共善用和戰兩手策略，武統雖備而不用，卻仍將以常態性的軍事活動侵擾臺灣，對臺灣軍民進行壓力。近年中共涉臺官員極力倡導統一，描繪「統一後」的情景，今年 8 月中共發布的第三份對臺白皮書，特別專章凸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光明前景」，顯示中共已在積極營造促統氛圍。預期「二十大」後對臺促統力度勢將強化。然而，中共對臺統一態勢越急迫，引發臺灣內部的反彈力道越強，只會讓兩岸「敵意螺旋」上升，這是中共對臺政策面臨的重大挑戰。

四、美國晶片法案對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影響

臺經院產經資料庫總監、APIAA 理事劉佩真主稿

- **行業競爭與地緣政治變化將迫使美國加大對陸半導體管制力道，包括管制對陸半導體出口 EUV、DUV 製程設備，《晶片與科學法案》對投資限制附加條款，成立 Chip 4 聯盟，對陸祭出新的四大出口管制等。**
- **中國大陸對半導體供應鏈安全、建立自主可控的目標迫在眉睫，但在美國卡脖子的政策下，中國大陸半導體國產化推進極為困難，未來恐將從先進封裝、第三類半導體進行突破。**

（一）前言

為扭轉過去美國大量將半導體製造轉往亞洲地區生產的現象，並將供應鏈遷徙回美國，企圖重新扶植美國半導體製造產業，增加半導體全球的市佔率和先進製程的製造能力， 2022 年 8 月 9 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晶片與科學法案》，總計將為半導體公司提供 527 億美元的撥款，當中在資金分配計畫主要以半導體製造激勵計畫（五年撥款 390 億美元）、商業研發和勞動力發展計畫（五年撥款 110 億美元）、美國勞動力和教育基金（2 億美元）、國防部國防基金（20 億美元）、國際技術安全和創新基金（5 億美元）為主，而此法案為製造半導體和相關設備的公司提供 25%的投資稅收抵免；此外，美國官方也授權未來幾年提供約 2,000 億美元的科學和技術研究資金，涵蓋人工智慧、機器人技術、量子計算、電池技術、生物技術等諸多對未來競爭力至關重要的領域。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法案中也同時禁止獲得聯邦資金的公司在中國大陸 28 奈米製程以下的先進製程晶片，期限為 10 年，若違反者，將需全額退還聯邦補助款。在此情況下，等同美方藉此吸引外資來當地境內投資外，也同步設限前往中國繼續投資，此局面對於原先已在中國大陸有大量產能，且此次也將前往美國大舉布局的 Samsung 影響最大，畢竟 Samsung 在中國大陸從

2012 年以來投資金額已高達 258 億美元，且該公司的中國大陸西安廠佔其公司 NAND Flash 總產能達到 42.5%，未來若 Samsung 無法持續升級西安廠的相關製程技術，則對其在記憶體的競爭力將產生負面影響，當然也間接衝擊中國大陸整體在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的建立與整體產能規模的實力。

雖然近期市場傳言美國管制半導體高階設備出口中國大陸的政策，可能對南韓的 Samsung、SK Hynix 等國際大廠「開後門」，讓這些企業得以順利取得設備，持續升級生產線並維持量產；不過美國此舉恐使得其他半導體供應國也將希望能仿效對南韓鬆綁的做法。如此一來，美國封鎖中國半導體業的發展成效也將受到考驗，故此傳言是否屬實，仍有待檢驗。

（二）對於中國半導體的影響狀況

美國近期不論是通過《晶片與科學法案》設下附加條款，或是藉由成立以美、臺、日、韓為主的 Chip 4 聯盟，甚至美國對中國大陸祭出新的四大出口管制，即管制半導體材料氧化鎵、半導體材料金剛石、開發 GAAFET 結構積體電路必須用到的 ECAD 軟體、用於生產和開發燃氣渦輪發動機部件或系統的壓力增益燃燒（PGC）技術等，皆反映美國對於中國大陸半導體業的管制力道持續增強，顯然承接先前華為禁制令、中芯國際出口禁制令一連串美中科技戰的戰火，短期內難以看到停歇的狀況。

美國的圍堵、全面監控政策，對於中國大陸半導體業將產生深遠影響，畢竟中國大陸 2021 年進口半導體的金額高達 4,326 億美元，年增率達到 23.6%，創下歷史新高紀錄，估計 2022 年規模仍會持續擴大，顯然中國大陸陷入缺「芯」的危機，需高度仰賴進口。儘管近期中芯國際有觸及 7 奈米製程生產、長江存儲於 NAND Flash 有所斬獲，但後續美國持續有所行動下，也讓中國大陸在先進製程、記憶體的發展火種恐熄滅，主要是美國持續掌握全球先進製程的半導體設備、關鍵核心晶片、EDA 等，更何況記憶體方面亦有侵權控訴的策略隨時可祭出，甚至中國大陸晶片人才匱乏的現象也日漸浮現，例如 2020 年中國集成電路相關專業畢業生規模為 21 萬左右，約佔畢業

生總數的 2.30%，而在 21 萬學生中僅有 13.77%畢業生畢業後從事集成電路相關工作，數量還不到 3 萬人，代表中國大陸高校培養的晶片人才可謂青黃不接，估計 2022 年晶片專業人才缺口將超過 25 萬人，顯然中國大陸未來在半導體國產化的推進面臨重重阻礙。

（三）未來中國半導體所面臨的挑戰

2023 年中國大陸半導體業景氣將跟隨全球的腳步同步呈現減緩的格局，畢竟部分晶片、成熟製程會逐步面臨供需平衡的狀態，況且對岸還會持續面臨來自於美方在半導體方面協同盟友的制裁與卡脖子政策等窘境。

事實上，未來中國大陸所面臨的發展困境仍不少，也就是即便官方對半導體業進行大幅扶植計畫，仍舊無法突破美中科技戰後，美國所設下的卡關問題，凸顯中國大陸半導體對國外先進製程產品體系依賴較重，高階產品的技術攻堅及創新問題迫在眉睫。同時過去中國大陸擅長藉由海外收購優質資產，快速發展半導體事業的捷徑已遭美國攔截，況且全球半導體興起保護主義，更增添陸方業者進行國際購併案的困難。未來包括臺灣、韓國、日本、歐洲、新加坡等要再大舉往中國大陸進行投資設廠，或與當地業者進行技術合作的難度提高，主要是各國均面臨來自於美方的壓力，對於中國大陸當地半導體業的發展相對不利。

五、中共對臺軍演後美軍及盟國軍事動態觀察

淡江大學戰略所副教授沈明室主稿

- **中共對臺軍演後，美軍持續聯合盟國定期巡弋臺灣海峽，美國會督促對臺軍售，駐日韓美軍制定、更新臺海應變計畫，以防範大規模軍事衝突。**
-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後將戰略重心轉向印太區域，已組建美英澳同盟（AUKUS）、四方安全同盟（Quad），在中共擴張及威脅下，東協國家追求戰略自主但仍傾向美國安全承諾，並承擔印太穩定的責任與義務。**

（一）前言

2022 年 8 月 4 日 7 日中共宣布對臺灣實施軍事演習，並在臺灣周邊劃設 6 到 7 個演習區進行飛彈射擊。中共在演習第一天，就對這些演習區域發射火箭及地對地飛彈，在射擊結束後旋即宣布開放管制區域。隨之而來的是中共海空軍在臺灣周邊及海峽中線大規模巡弋與演習，尤其無人飛機的大量使用，及例行性的穿越海峽中線北半部。讓過去既有海峽中線默契受到破壞而模糊化，這樣的情勢則被國外媒體視為第四次臺海危機，並認為已經是一種新常態（New Normal）。

當過去五年中共對臺武統論甚囂塵上時，臺海安全受到廣泛關注，媒體也形容臺灣是「世界最危險的地方」。臺灣本身位居第一島鏈中央位置、也是掌控全球供應鏈關鍵角色及民主國家發展典範，如果臺灣被中共併吞，對印太地緣戰略、全球經濟與民主政治發展，都會造成重大的影響，這使得印太區域國家日益關注臺海安全。尤其在俄烏戰爭爆發後，中共內部民族主義加劇武統論調，許多國家擔心中共將循俄羅斯的模式進犯臺灣，必須及早在軍事部署做出反應。

（二）美軍動態

美國雖然並未直接介入俄烏戰爭，但北約國家感受到俄羅斯的威脅，美國必須防止戰爭擴及北約，因而間接支援烏克蘭作戰。從協助訓練、支援重

型武器彈藥、提供目標情報及衛星資訊等，使烏克蘭得以在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戰爭中，獲得作戰優勢。除了戰場上軍事作為外，美國透過政治與經濟手段制裁俄羅斯，但是對於中共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耿耿於懷，必須防止中共趁機在印太區域興風作浪，牽制美國對歐洲的軍事協助。這使美國必須在印太區域展現足夠軍力，以嚇阻中共貿然對臺灣採取軍事行動。

1. 定期巡弋臺灣海峽

從中共開始在南海進行島礁軍事化以來，美國就以航行自由行動來凸顯南海及臺灣海峽釋放水域並非中共的內海。美國的軍艦幾乎每個月一次經過臺灣海峽，而在中共軍演過後，盛傳美國航空母艦可能穿越臺灣海峽，最後則由兩艘美國軍艦取代。九月則由美國及加拿大軍艦聯合巡弋，是否也成為一種新常態，值得觀察。

2. 對臺持續軍售

基於烏克蘭戰爭的經驗，美國必須明確警告中共，不能以武力片面改變臺海現狀，但又必須及早防範中共可能對臺灣突然襲擊，除了美軍部署與準備外，如何以軍售方式，提升臺灣軍力也非常重要。雖然拜登政府傾向出售臺灣彈藥、作戰系統及後勤料件，如果臺灣面臨緊急需求，可以依照審議中的「臺灣政策法」，先支援臺灣相關的武器平臺。尤其如海馬士長程多管火箭、新型自走砲等。在國會壓力下對臺軍售仍會持續，面對中共可能犯臺，兩國對於品項及數量比較容易有共識。

3. 制定或更新應變計畫

從冷戰時期開始，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現今印太司令部）對於臺海衝突就制定應變或是作戰計畫，隨著區域情勢發展而有所調整。只要中共可能入侵臺灣，而且美國必須介入，這樣的作戰與應變計劃就必須維持及更新。在此作戰計畫中，均納入整個印太司令部部隊的任務與角色，以及其他司令部或軍種可能的支援。駐日美軍屬於第二線，最快能夠到達臺灣的美軍部隊。平常許多針對臺灣海峽的海空巡邏任務都由駐日美軍的飛機進行；因此，駐日美軍在作戰計畫中將扮演重要角色。另外，駐韓美軍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朝鮮

半島的衝突，惟近期以公開表示要制訂對臺海應變計畫，顯示美國已經在為美中臺海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而準備。

（三）盟國軍事動態

1. 北約同盟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後，將重點放在印太區域，但是在美國單一國家軍力不足下，必須尋求其他盟國支援，尤其與美國簽訂防衛協定的軍事同盟。雖然北約因烏克蘭戰爭處於防範與警戒狀態，但對於中共在印太擴張，北約早已有所警覺，並在 2021 年北約高峰會中，明白警告中共的軍事威脅。北約國家如德國、法國、加拿大陸續派遣軍艦至西太平洋巡弋，美國重要盟友英國甚至派遣航空母艦西太平洋進行聯合訓練，德國也派遣軍機至印太區域航行。這都顯示美國與北約同盟共同關注中共軍事威脅，在此區域展現軍事實力，以期發揮嚇阻作用。

2. Quad 同盟國家

原本 Quad 同盟國家中最重視臺海安全問題的是美國，日本則因為憲法約束，對臺海安全介入處於被動狀態，通常要在美國介入下，日本基於同盟關係而必須介入，惟仍處於協助或後勤角色。但在前首相安倍晉三上臺後，警覺臺海安全對日本的關鍵性影響，對於臺海問題的關切與防範比以往更為積極。不論是在雙邊會議或高峰會當中，日本必然會提出臺海問題的關切。日本對於西南諸島軍事部署的經營，以及對穿越宮古海域的監控仍會持續。如果美日可以共同巡弋臺灣海峽將是深化臺美日合作的指標。

就澳洲而言，因為軍隊規模的限制只能扮演協同美國作戰的角色，尤其在簽訂「美英澳同盟」（AUKUS）之後，勢必承擔更多任務與角色，但比較偏重在南海問題。澳洲將來核潛艦或是海軍艦艇都可以協助美日部署，展現嚇阻態勢，澳洲也會持續參與美國或日本主導的聯合演習。

就印度而言，雖然屬於四方安全同盟的國家，但是與其他三國並未簽署防衛協定，也不是軍事同盟，對西太平洋的議題沒有義務及責任。但因為印度的「東進政策」，以及與日本的友好關係，印度不會放棄聯合其他區域強

權，東西夾擊中共的機會。印度不願意與美國建立同盟，繼續維持戰略自主的地位，但在中共逐漸擴張，軍力可以匹敵美國，中印情勢持續升高之際，仍需回頭尋求四方安全國家的協助。印度相對的必須承擔在印太區域的安全責任與義務。

3. 東協同盟國家

在東協十個國家之中，因為地緣戰略利益的差異，對於臺海議題的關切程度也不同。其中南海鄰接國家以及與美國簽署軍事同盟的國家，雖然不願意選邊，也無法擁有太多的自主權。菲律賓政權更替之後，對中共政策已有轉變，馬可仕政府極力捍衛菲律賓在南海的主權，必須仰賴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由於菲律賓海空武力薄弱，很難在臺灣海峽扮演安全性角色，但肯定的是，臺海衝突必然外溢到南海及菲律賓，菲律賓必須提供美國海空與後勤基地。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不希望在美中兩國選邊，但是在與美國簽署安全合作條約時，某種程度已經選擇美國作為安全合作夥伴。要維持美國安全承諾，對於美國在地緣上安全要求，必須加以回應。雖然美國與新加坡相關同盟機制並未針對臺灣海峽，但新加坡將更加關注臺海情勢，並在戰略回應上保留彈性空間。

如果中共堅持以「九段線」做為擁有南海主權的依據，越南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仍有可能與中方在南海主權議題發生碰撞。越南與俄羅斯及印度安全關係密切，但能抗衡者僅有美國。越南將會保持大國平衡政策，但樂見美中碰撞下，中共國力的衰退。

（四）結語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後的軍演是否成為第四次臺海危機，各方有不同見解，但是非常肯定的是，臺海安全議題已經隨著中共強勢擴張及蠻橫對臺態度成為國際共同關注的議題。影響所及，各國也會針對臺海情勢進行分析與判斷並對可能最壞的發展，預先做好防範措施。臺灣直接面對中共的軍事威脅，歡迎國際支持與協助，但必須首先強化防衛作戰的訓練，對中共

對臺政治統戰、經濟打壓、灰色地帶威脅，做好能攻能守，有效防範的萬全準備，才能獲得友盟國家的支持與協助。

六、陸青年失業率攀高之社會影響觀察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授潘兆民主稿

- **中國大陸 7 月份的青年失業率飆升至 19.9%，為中共國家統計局 2018 年 1 月發布該項指標以來最高數字，高出歷史均值 12.5%甚多，不利於內部社會穩定及政治體制。**
- **在受疫情衝擊經濟持續下滑的大環境之下，清零封城政策，萎縮的製造業，屢受挫折的教培行業，以及互聯網企業的裁員等，早已無力吸納大量年輕勞動力，嚴峻的就業形勢必然將持續一段時間。**

（一）前言

疫情後的中國大陸正待解封後景氣復甦之際，卻不斷傳出年輕人失業率持續攀升的警訊。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今年 7 月公布的數據顯示，6 月份中國大陸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5%，雖有連續兩個月回落，但 16-24 歲年輕人口失業率卻從 4、5 月時期的 18.2%與 18.4%，上升至 19.3% ；到了 8 月 15 日發布 7 月份的失業率時，更飆升至 19.9%，比 6 月又增升 0.6 個百分點。對此，統計局發言人付凌暉歸因於「受超預期因素影響，就業壓力有所加大」。8 月 19 日「美國之音」引述中國大陸北京經濟學家李泓（化名），指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從來都沒比歐洲高過，過去兩個月是頭一回。同時，他也認為真實的失業率實際超過 20%。

基本上，這是自中共國家統計局 2018 年 1 月發布此項指標以來的最高數字，高出歷史均值 12.5%甚多。這對長期力求社會穩定的中國大陸而言，絕對是一項相當嚴峻的警訊。毫無疑問，年輕人失業率高，充斥著社會不穩定因素，缺乏就業管道，沒有工作又無發展前景的年輕人，不是選擇消極離開就業市場，就是很可能走上街頭，發洩內心的不滿，勢必衍生眾多的社會與經濟問題，這絕對不利於中國大陸的社會穩定，甚至撼動政治體制，這是中共掌權者最擔心的部分。

（二）導致大陸青年人失業率高不下的主因

1. 疫情衝擊下堅持清零封城政策，產業經營受阻而難以吸納就業

依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發言人付凌暉的解釋，近期大陸青年人失業率高，「一方面企業受疫情衝擊，生產經營困難，吸納就業能力有所下降。尤其是青年人就業佔比較高的第三產業恢復緩慢，制約青年人就業。另一方面，青年人進入到勞動力市場，目前更多傾向於穩定性比較強的崗位，求職期待和現實崗位需求存在落差，影響青年人就業入職」。

毋庸質疑，中共的清零封控政策也導致更多的工廠相繼關門。今年以來中國大陸製造大省廣東當地企業因持續的清零封控措施，導致工廠無法保證正常生產，企業虧損嚴重，經營困難而倒閉，世界工廠的榮景不再。例如廣東國際知名消費電子產品廠商「愛高電業」，於今年 8 月底的通告中表示，自疫情爆發至今，封鎖防疫等出口業務遭受巨大打擊，目前公司虧損嚴重，繼續苦撐也無法扭轉頹勢，因此決定全面停止生產。根據中國大陸清華大學的統計數據，今年上半年共計有 46 萬家公司宣布倒閉；有 310 萬左右的個體工商戶註銷公司。

2022 年 6 月 15 日中共統計局發布最新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顯示，第二季 GDP 按不變價格計算同比增長 0.4%，上半年同比增長 2.5%，遠遠低於 2022 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所提出 5.5%的預期目標，意味市場發展不如預期，所以青年失業率的居高不下，正反映出整個中國大陸產業發展面臨相當大的衝擊，這是做為產業製造大國從未發生的現象，過去只要年輕勞動力一出來，就能即時被整個市場使用，而今製造業萎縮、榮景不再，經濟下行、前景不樂觀，本土企業又不做新的投資，外國廠商也不願增加投資，勞動就業市場需求勢必下降。

事實上，面臨衰退的不止是製造業，其他貿易公司、吸引大量年輕高收入的高科技公司、電子行業、互聯網等等，都面臨嚴重的事業萎縮過程。自去年開始北京一系列加強監管作為，新創環境急劇冷卻，年輕人就業市場受到大幅衝擊。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大陸推進疫後復甦之際，騰訊、字節跳動等互聯網巨擘，卻迎來新一波裁員潮。據員工透露，騰訊開始對遊

戲團隊裁員，字節跳動也再次向教育部門開刀，部分領域已涉及核心部門，比前一輪裁員的情勢更加嚴峻。其實早在 2021 年末，騰訊、字節跳動、阿里巴巴等皆陸續傳出裁員的訊息。業內人士認為騰訊等互聯網大戶作為中國大陸經濟的最前沿，開始裁員是非常壞的徵兆，勢必產生極大的外溢效應。惡劣的情勢不是僅此，近期陸知名新創數據服務商 IT 桔子，公布上半年新創募資情況，罕見出現連兩季腰斬、上半年衰退 42.6%。直逼兩年前疫情剛發生初期狀況，標誌著接下來中國大陸年輕人要面對的職場挑戰，勢必會更為嚴峻。

2. 持續清零封控擾亂企業的正常經營，阻卻外商投資意願甚至外移

以中國大陸近期大力宣傳的大灣區經濟發展為例，「南華早報」9 月 8 日報導，許多跨國公司內部人士透露因清零政策供應鏈不穩，規劃推遲在中國大陸的業務擴張計畫，或是開始縮減業務。在廣州的日本諮詢公司高階主管認為，雖然北京大力支持粵港澳大灣區，設點企業可從中獲益，但未能抵銷嚴苛清零防疫所帶來的強大負面影響，除非迫不得已，不會離開中國，但也缺乏增加投資的動力。

中國大陸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在今年 4 月份接受瑞士「新蘇黎世報」的「市場」（the Market）網站採訪時表示，愈來愈多政治事態發展對於商業產生影響，官方強硬疫情清零政策，致使更多的公司必須向中國大陸以外的亞洲國家尋求採購，如此必然增加這些企業的採購成本。但是更昂貴的採購總比沒有強；這也表明北京願意以「犧牲經濟優先」。

3.「雙減負政策」使教培行業受嚴重挫折

2021 年年初中國大陸為減負而整頓教培行業的「雙減負政策」，不僅對學校的老師同學有影響，對線上線下的校外補教機構影響也非常大。不少補教行業巨頭，選擇關閉義務教學階段的學科類培訓服務。教培機構關閉服務退出市場，造成大量補教行業員工失業，大部分離職皆屬青年員工，只能再次流入就業市場，無形中加劇的結業競爭壓力。如中國大陸教培業龍頭「新東方」市值下跌 90%，辭退員工高達 6 萬人。另一家領頭教培機構「猿輔

導」，在去年中旬也裁員將近一半。業內人士估計，此次「雙減負政策」將影響到多達 3 百萬的就業崗位。

中國 21 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在 2021 年 7 月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表示，具有合法資質的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大批關門，本身就會帶大量員工失業以及退費糾紛。校外教育培訓業保守估計有 8,000 億產值，校外教育培訓的從業人員有幾百萬之多，培訓機構關門也就意味著員工失業。

4. 中國大陸再創歷史新高的畢業學生數大量投入就業市場

今年 6 月畢業季開始，中國大陸高校畢業學生數再創歷史新高，超過 1 千萬，據中共教育部統計，2022 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達 1,076 萬人，比 2021 年增加 18.4%，今年畢業生人數首次突破千萬大關，數量創歷史新高。加上幾百萬的職業學校的畢業生，以及投入職場的高中畢業生，加上中學畢業生，綜合估算已接近 2,000 萬。而去年大陸城市新增崗位只有 1,100 萬。換言之，其實 16-24 年輕人的失業率，應該是遠遠高於官方公布的數據。在經濟持續下滑的大環境之下，萎縮的製造業，屢受挫折的教培行業，以及互聯網企業的裁員等，早已無力吸納大量年輕勞動力，嚴峻的就業形勢必然將持續一段時間。

（三）結論：日趨嚴重的失業問題，讓年輕人對未來茫然與焦慮

中國大陸飆升至 19.9%的 7 月份年輕人的失業率，對比鄰近的日本 3.8%與韓國 7.3%，高出甚多；即使與稍高的美國及歐元區相比，也不過是 8.1%與 13.1%，適足以證明，中國大陸青年失業問題相當嚴峻，不容小覷。

近期大陸網路熱議「躺平主義」，係指年輕人出於對工作環境等社會情勢的無力感，與其堅持奮鬥，不如消極「躺平」的處事態度。激起眾多中國大陸網友的回響，「躺平學」甚囂塵上。有中國大陸學者認為「躺平族」對於經濟發展相當不利，消費者是拉動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因素，但年輕人沒錢就不消費，這樣勢必對經濟有負面影響。

中國大陸年輕世代近年從「佛系」、「內捲」，到當下的「躺平」、「擺爛」，充斥著再努力打拼，也絲毫看不到出路的氛圍。試想，剛走出校

園的大學畢業生，長期找不到工作，久了就會喪失鬥志，失去信心，即便有能力還是不想工作，這些人不會計算在失業率中，他們不是「失業者」，而是「無業遊民」於是直接「躺平」。與其在又累又低薪工作上，苦苦掙扎，不如對工作或生活放下，要求不高，日子一樣輕鬆過。這隱含著對現實世界的無聲抗議，更可能是，難以適應當下前經濟結構轉型，只能擁抱無力感的氣餒心態作祟。但不論何種心態，其背後顯示者，實際上不是中國大陸現代年輕人的一種灑脫和寬容，而是對未來的茫然與焦慮，確實已讓上述現象，更為嚴峻。年輕世代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重要資產與潛在生產力，北京勢必嚴肅以對。

七、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改選及中梵關係觀察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教授張家麟主稿

- **第十屆中共「一會一團」改選趨向年輕化，增加監察會組織，彙徵中共天主教自治模式異於全球天主教組織，符合習宗教自治政策，並對中共黨國體制效忠，朝天主教中國化方向邁進。**
- **「一會一團」形式將教宗尊為宗教領袖，實質接受中共管理。梵諦岡為續簽「梵中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及梵中關係正常化，持續對中共迫害宗教人權事件視而不見，犧牲地下教會的利益。**

今年（2022）8 月 18 至 20 日，中國大陸天主教界於湖北武漢召開中國天主教第十次全國代表會議。開幕式由主管官署統戰部副部長兼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崔茂虎講話，之後進行改選新一代的「一會一團」天主教界領袖。會後，23 日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接見並發表政策性的談話。本文以此為基礎，將分析「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改選現象」、「改選之後透露的意涵」及「估計未來梵中的關係走向」等三個面向等相關問題。

（二）改選概況

1. 換屆情形

中國大陸天主教界於 1958 年在共產黨的卵翼下，成立「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於 1962 年更名為「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作為中國大陸境內天主教最高的行政組織，之後每隔 5-6 年時間進行改選換屆 。1980 年再成立「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及「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1992 年將教務委員會併入主教團的下層組織。「愛國會」與「主教團」形成中國大陸境內天主教的「一會一團」併行最高組織。

第十屆改選出愛國會主席李山主教，副主席：沈斌主教（海門教區）、黃炳章主教（汕頭教區）、岳福生主教（黑龍江教區）、孟青錄主教（呼和浩特教

區）、吳琳修女（漢口教區）、施雪琴教友、周小雄教友、劉新紅主教（安徽教區）、高伏友神父、孟寧友主教（太原教區），秘書長譚立鑄教友。

另再選出沈斌主教為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主席，李山、郭金才、裴軍民、楊曉亭、何澤清、楊永強、李穌光、王仁雷、羅雪剛、崔慶琪為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副主席，楊宇神父為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秘書長。

2. 新增監事會

與過去「一會一團」組織最大的差異是本屆多了「監事會」，這樣的改變符合習近平對宗教自治、自我監督要求的政策。從本屆開始，選出監事長詹思祿主教，方建平主教、劉元龍教友當選副監事長，雷世銀主教、舒南武教友當選監事。由於只知此組織變革的方向為監督「一會一團」的運作，未來成效如何，尚有待觀察。

與過去雷同，是將資深的前屆「一會一團」主席房興耀、馬英林主教，分別推舉為本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名譽主席及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名譽主席。他們擁有形式上的榮譽職頭銜，頂多可以提出建議，而無實質上的職權。

3. 成員年輕化

換屆之後，天主教愛國會、天主教主教團的成員，平均年齡層降低，由「中壯年」取代「中老年」世代。其中，愛國會主席李山（57 歲），副主席沈斌（52 歲）、黃炳章（55 歲）、嶽福生（58 歲）、孟青祿（60 歲）、吳琳（56 歲）、劉新紅（58 歲）；皆在 60 歲以下，平均年齡 56 歲。

主教團主席沈斌（52 歲）主教，副主席李山（57 歲）、郭金才（54 歲）、裴軍民（52 歲）、楊曉亭（58 歲）、何澤清（54 歲）、王仁雷（52 歲）、羅雪剛（58 歲）、崔慶琪（58 歲）；皆在 52-58 歲間，平均年齡 55 歲。至於，監事會的年齡層稍高，如詹思祿（61 歲）、方建平（60 歲）、劉元龍（68 歲），雷世銀（59 歲）、舒南武（67 歲），平均 61 歲，屬於中老年世代。。

4. 支持擁護中共領導

天主教「一會一團」與基督教愛國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雷同，皆歸中國共產黨統戰部、國家宗教事務局管理。後者給予前者合法的特殊寡占宗教利益地位，前者也相對的支持、擁護共黨領

導。形成上下隸屬的「恩庇主義」（patron- clientelism）關係。中共保護五大宗教組織在境內的合法權利，形同給予恩惠，而五大宗教組織及其成員，回報此恩惠，接受其領導，並對黨國體制效忠。

在這次改選會後，於 8 月 23 日下午立即於北京召開聯席會議，由沈斌主持。楊永強主教、潭立鑄教友、楊宇神父帶領學習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精神；郭金才主教組織學習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崔茂虎在中國天主教第十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的重要講話；沈斌主教傳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會見「一會一團」第十屆領導班子時的講話精神。「一會一團」領導幹部彼此分工，集體學習中共統戰部、國家宗教局長及全國政協主席的講話內容要旨，向中央表態效忠，展現對黨的宗教政策認同。

（三）相關意涵

1. 維護國家主權

中共一向標舉國家主權至上原則，境內宗教事務外國不能干涉。就天主教來看，中國大陸模式為全球天主教組織的例外。全球各地的天主教組織皆按梵蒂岡的標準選出教區的神父、主教或樞機主教。然而在中國大陸境內，在中共建政後，就高舉「天主教愛國會」的標誌，拒絕梵諦岡的干預。

因此，2022 年中國大陸天主教的「一會一團」的改選、換屆，選出新的教會領導組織只是延續過去在中共一黨獨大，建構出「自治、自傳、自養」三自愛國教會的傳統。意味中國大陸各地天主教區內的信徒、神父、修女、主教，可以憑其自由意志及傳統，選拔出各省區的愛國會或主教團的代表，再改選、組成中國境內最高階層的天主教「一會一團」自治組織。此舉象徵中共主權至上，無須外人干預情況下，「合法」產生第十屆天主教「一會一團」，來領導中國大陸境內各省區的天主教徒。

2. 學習習近平宗教政策論述，推動宗教中國化

第九屆天主教「一會一團」於 2016 年選舉產生。習近平主政下，2015 年就在全國宗教事務會議上，提出「宗教中國化」的芻議。最近幾年此概念不斷賦予新意涵，成為中國境內各宗教都要朝「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

愛中華文化」的方向前進，並被官僚體系擴張解釋，成為熱愛「習近平」的宗教主張及作為[1]。

在此次開幕式中，中共統戰部副部長兼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崔茂虎就呼應習近平的主張，要求天主教界除了應該維護傳統獨立自主辦教的原則外，尚要認真學習總書記習近平對宗教工作的重要論述與中央政策，以及推動「天主教中國化」，團結天主教界人士，迎接「二十大」的召開。

8 月 23 日汪洋接見「一會一團」幹部時說得更細膩與透徹。在傳統立場部分，要求天主教領袖維持自主辦教，自覺抵禦境外勢力滲透，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在對習近平的宗教中國化的論述，他要求天主教界應該引用「中國文化、語言、表達方式」來闡釋與研究教意及經典，深入推動中國天主教中國化。

3. 培養愛黨愛國之宗教人才

中共始終將黨置於國之上，國家機器中的宗教管理組織，再置於各宗教組織之上。形成以黨領導國，以國管理宗教的「黨國二元」宗教管理體制。天主教「一會一團」即是在此體制下，接受黨及國的指揮。

汪洋重申過去黨國領導宗教的論述，他也認為天主教界要注重組織及人才的培育，唯有培養在政治上愛黨愛國，宗教神學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教眾之天主教神職人員，才能建構堅強的帶領群眾認同黨國組織。形同黨控制「一會一團」，「一會一團」控制了全中國大陸境內優秀的愛黨愛國神職人員，進而控制了天主教界的會眾。。

4. 在黨領導前提下維持天主教自主性

「一會一團」的成員包含曾被梵蒂岡「絕罰」[2]的主教及梵蒂岡接受的主教兩類人員。

[1] 在「宗教中國化」被基層官員擴張解釋下，習近平的肖像常取代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家裡的十字架或耶穌肖像；也會取代藏傳佛教的活佛肖像。

[2] 絕罰（拉丁語：Excommunicatio，字面上的意思是斷絕來往），又譯破門律，分為天主教教宗、主教絕罰兩類。是指開除其教籍、驅逐出教、逐出教會等，為宗教內的懲罰行為，被絕罰之人將與教會隔離，沒有教會所予之救贖；而新任教宗或主教可以對前任之絕罰赦免。

在方濟各教宗上任前，梵諦岡歷任教宗曾經分別對馬英林、劉新紅、郭金才、黃炳章、雷世銀、岳福生、詹思祿等主教，施予「絕罰」處分。到 2018 年中梵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時，方濟各赦免這些主教。在本屆仍然可看到這七位主教擔任要職，黃炳章、岳福生、劉新紅擔任「一會」副主席，郭金才擔任主教團副主席，馬英林擔任主教團名譽主席，詹思祿、雷世銀擔任監事會監事長及監事。代表中共高層同意倚重曾被絕罰的主教，在黨領導下，維持天主教界自行選舉的自主性。

（四）研析意見

今年「一會一團」換屆改選，與未來中梵兩國之關係並無直接關聯，但是我們依舊可以從中觀察梵蒂岡對改選後中國天主教界的回應，以及方濟各教宗對中共管理宗教的各項作為幾乎「噤聲」，而作為未來中梵兩國關係「正常化」的算計。

1.「一會一團」，「捨梵諦岡、就中共利益」

梵諦岡教宗方濟各為中國天主教界形式上的宗教領袖，而天主教「一會一團」則屬中共政權下的愛國教會組織。「一會一團」寧可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非聽命於梵諦岡的指揮。頂多奉教宗為形式上的宗教領袖，實質上接受中共的管理。「一會一團」由中國大陸教徒自行選拔修女、神父、主教，分別擔任其主席、副主席，監事會監事長與副監事長等職。當梵諦岡與中共利益衝突時，合理估計「一會一團」將捨梵諦岡而就中共的利益。

2. 梵諦岡為續簽〈中梵主教任命臨時協議〉作準備

到目前為止，梵諦岡從未對中國改選「一會一團」有任何異議，形同「默認」改選的結果。報載李山主教擔任愛國會主席，沈斌主教為主教團主席兩人皆曾被梵諦岡晉封為主教，似乎象徵中共對梵諦岡表達善意。但是，綜觀選出的人選，依舊有 7 名主教曾被絕罰。現任教宗雖赦免其「絕罰」；形同檯面上的「一會一團」成員皆為梵諦岡同意的人選。只不過，這些人選是由中國大陸境內自行產生，而非由梵諦岡系統產生。

由此看來，梵諦岡尊重中共國家主權的前提下，接納中國天主教區自行產生「一會一團」的最高組織模式；進而接受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改選結果。這項默契，鋪成中梵兩國的友好氣氛，也為今年 10 月續簽「中梵主教任命臨時協議」作準備。

3. 梵諦岡對中共積累善意

2018 年首度簽梵中主教任命臨時協議，2020 年續簽此協議。如果今年第二次續簽，教宗方濟各還是可以擔任中國教區的天主教領袖。教宗為了完成其歷史定位，除了對中共不斷遞出橄欖枝，多次表達祝福中國大陸人民及中共最高領導政權，也渴望有機會拜訪中國大陸或在其他地區與習近平見面。這些政治動作，無非表達梵諦岡對中共的善意。

除了累積這些善意外，梵諦岡對中國大陸境內受宗教人權迫害者幾乎完全噤聲。例如：教宗從未批評中共在新疆對伊斯蘭教徒送入在教育營的不當作為，也未關注藏傳佛教徒受到壓制的現象。連基督教、天主教地下教會受衝擊，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因違反「國安法」被拘捕，他都未表達關切。教宗這些作為，就是希望有機會訪問中國大陸，或是常態性的巡視中國大陸教區，最後兩國得以建交，梵中關係進一步發展。

4. 要求地下教會加入愛國會

「一會一團」改選之後，它們成為中國大陸境內天主教實質最高領袖及組織。在梵中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簽定的框架下，教宗曾於 2019 年 6 月 28 日書寫「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形同放棄地下教會的信徒、神父、主教及樞機主教。希望他們加入愛國教會，接受「一會一團」及中國共產政權的領導。方濟各這項主張，完全違背歷任教宗的作為，也捨棄原本效忠梵諦岡 1,000 萬子民[3]。他不只要求部分教區的主教讓出位置給愛國教會主教[4]；連在境內地下教會主教、神父拒絕加入愛國教會而被逮捕，教

[3] 教宗方濟各要求地下教會信徒、神父、主教加入愛國教會，在宗教研究者看來，形同「教難」（孔令信，2022.8.27）。

[4] 2017 年 10 月、12 月，在教宗方濟各主導下，中國大陸汕頭教區（廣東省）主教莊建堅和閩東教區主教郭希錦辭職，分別讓位給中共自選的官派主教（也稱非法主教）黃炳章和詹思祿，他們只能擔任副手。

堂被強制拆除，也從未表態關心。估計在未來，這種事件依舊重演，教宗為了追求他在中國大陸的宗教與政治利益，將持續放棄其子民。

（五）結語

第十屆天主教「一會一團」的改選多了監察組織，成員年輕化，也與歷屆天主教「一會一團」同樣表態支持中國共產黨及國家部門的領導。這項改選透露出中國天主教在國家主權至上的原則下，建構自選「一會一團」的愛國教會最高組織。中共掌控此組織，這些教屆組織成員也願意表態學習習近平的宗教論述及國家宗教政策，朝天主教中國化邁進。中共也透過「一會一團」，希望他們能夠為黨國培養優秀天主教界人才，進而攏絡天主教徒接受黨國領導。

至於中梵關係，可以估計梵諦岡尊重中共「一會一團」的特殊模式，未來「一會一團」只會尊梵諦岡教宗為形式上的宗教領袖，實質上以中共馬首是瞻。在「一會一團」人選中，依舊可以看出中共強烈的自主性，梵諦岡也全盤接受未表達異議，無發在未 10 月續簽梵中主教臨時協議累積善意。當然梵諦岡的目的在於梵中建交，因此它對中共在境內的宗教人權迫害事件，幾乎視而不見，也未置喙一語。而且方濟各為了進入中國大陸廣大禾場，在可預見的未來，恐會持續犧牲天主教地下教會信徒、神父、修女、主教的利益。

八、「臺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解析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系教授董立文主稿

- **「白皮書」目的在統一思想、說明立場，為動武找理由，逼迫臺灣人民選邊站。相較 2000 年版本，刪去「統一後臺灣實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不派軍隊和行政人員駐臺」的承諾，以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使得「白皮書」的強制性與暴力性更加顯著。**
- **鑒於中共先宣布對美國歐洲等外國人與企業的制裁後，才制定實施《反外國制裁法》，或對臺制裁後再提出新法律或施行細則類的恐嚇工具。**

（一）前言

中共於今年（2022）8 月 8 日發表「臺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這份白皮書的有四大目的：

1. 對內對外統一思想、說明立場，規定原則方針與主要政策的內容。換言之，中共「二十大」將提出所謂「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的方向與內容大體成形。
2. 白皮書 13,000 餘字，五大重點是（1）中華民國不存在了；（2）過去 70 多年來的兩岸關係互動史是中國統一的進程史；（3）反對任何形式的臺獨，逐步明確不支持統一就是臺獨的策略；（4）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統一；（5）統一後的治理安排。
3. 為動武找理由，傳達統一不能等的急迫感。
4. 落實統一有利與臺獨有害的政策規劃，逼迫臺灣人民選邊站。

本質上，白皮書還是屬於中共對內統一思想的宣傳品，在臺灣與國際社會上並未造成影響，中共曾於 1993 年與 2000 年曾發表兩份白皮書，不但沒有獲得任何政策成果，反而使兩岸關係漸行漸遠。這次白皮書的內容則偽造歷史、曲解國際規約與漠視現實，更蠻橫的制定統一的過程與結論，荒唐的安排臺灣未來，可謂左派幼稚病與左傾盲動主義集其一身。空想統一前途，

背離臺灣民意及國際認知，更有可能讓未來的兩岸關係脫鉤斷鏈，回到 30 年前。

（二）白皮書的本質是謊言與暴力

白皮書是在美國眾議院院長裴洛西訪臺後，北京發動一連串圍臺軍演之際公布的；顯然，白皮書是早已寫好的東西，不過是選擇美臺關係增進的歷史時刻發布，希望造成外界裴洛西訪臺對臺灣不利的印象。換句話說即便裴洛西沒有訪臺，這份已寫好的白皮書也會另擇時機與藉口公布。由此可見，北京心裡清楚，臺灣人民不會接受白皮書的主張與內容，挑這個時機發布，反映出中共自己都把這個白皮書當成報復臺美關係的工具，當成恐嚇臺灣人民的手段來運用。

從白皮書的目錄和綱要區分五個部分：1.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容置疑也不容改變；2.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推進祖國完全統一；3.祖國完全統一進程不可阻擋；4.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推進祖國統一與；5.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光明前景。但是通篇都是謊言與暴力思想。

1. 關於國家與領土

白皮書的論述只有「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句話，「中華民國」出現過一次。通篇都是在歷史上、政治上、國際法律上和程序上論述「中華民國不存在了」。事實上從 1911 年到現在，無論在歷史上、政治上、國際法律上和程序上，中華民國一直都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從未一日治理過臺澎金馬，以扭曲事實的「一個中國原則」，錯誤引用聯合國憲章，妄稱對臺擁有主權，挑戰國際秩序，已遭到國際社會及眾多民主國家的嚴厲譴責與堅決反對。

至於「臺灣自古屬於中國...」、「從西元 230 年三國時期...」，若此歷史邏輯成立，則中共立刻要跟周邊所有國家開戰，無需太遠，看看 300 年前清朝盛世的疆土範圍就可知。光是帝俄與沙皇時期，就侵占中國大陸超過 588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反之而言，若從過去 2,000 年的歷史來看，新疆就有

1,500 年不屬於中國。中共號稱中國行王道不行霸道，難道過去 2000 年來中國所增加的領土，都是外國贈送的？若外國依照中共邏輯要求還回領土，那中國大陸的領土面積是否要回到西元 230 年？中共大量變造與偽造歷史，於是在國際間出現「中共黨史偽造學派」，主張清算中共偽造歷史的神話，依據正確史實，才能有正確的史識與史觀。

2. 關於一國兩制

這次白皮書所談的「一國兩制」等等方案，早在 1985 年翁松燃教授就指出：「一國兩制」在本質上存有矛盾性、壓倒性和過渡性。所謂矛盾性，是「提議一個資本主義地方體系在共產主義的中央政府管制下運作」；所謂壓倒性，是因為「兩制」在現狀和體積上都不均等，以致在正常軌跡發展下，一方很可能會吃掉另一方；至於過渡性是因為資本主義體系維持的時間有限制，將來實行社會主義或多或少已先預定。當時，翁教授還提出若港人在中國大陸上犯罪跑回香港是否應該引渡回中方受審？

另外，1985 年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李怡同樣提出：「一國兩制」的最根本問題安在？國家權力最大化的一黨專政，豈容香港這另一制的人民權利去分薄它的國家權力呢？提出「一國兩制」只不過是香港還沒有到手，而中共那時還需要香港這個對外視窗，是一黨專政的政權不得已的權宜之計，一旦到手跟著覺得「一國」已經夠強時，自然就「一闊臉就變」啦！

不幸的是，37 年後這兩位先知的預言完全正確的實現，今日的香港已經面目全非，說好的 50 年不變，變成哲學概念予以否定；承諾的特首與立法會議員「雙直選」，不但背信忘義，還強加國安法枷鎖在香港人民身上，改造選舉法制讓香港變成專制獨裁的一部分。「一國兩制」的矛盾性、壓倒性和過渡性，終究指向一個欺騙性而已。

總體來看，白皮書並無任何新意，每一句話、每個主張過去都出現過，甚至在習近平時期反覆地說，可能有意義的是，這份白皮書沒說的是什麼？首先，最引人注意的除了刪去「統一後臺灣實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不派軍隊和行政人員駐臺」的承諾外，還有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強調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使得這份白皮書的強制性與暴力性更加顯著。

（三）兩岸法律戰的問題

5. 中共沒有民主法治思想

中共的法制思想、體制與民主國家的法治理念、體制截然不同，甚至相反。對中共而言，法律只是一種政治工具與宣傳手段，有法不依、無法照做的現象非常普遍。

首先，2017 年關於「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定調：「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法制：不是中國共產黨靠法制存在，而是法制靠中國共產黨而存在。既然法制靠中國共產黨存在，那當然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當然是黨大」。

其次，2021 年北京訂定香港版國安法，其立法違反外界所熟知所有的立法原則：不溯及既往、無罪推定、信賴保護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法律明確性、法律安定性、正當法律程序...，而令國際社會瞠目結舌。中共無法無天的現象，不勝枚舉。

再次，中共涉外法律講求的是實力原則，若聚焦在臺灣海峽以及中共 2021 年 1 月 22 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警法》問題，中共自取所需、自我詮釋國際法。中共研究法律的主要目的是進行法律宣傳戰，不是用來遵守。此即「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內」，管轄權也必然在大炮的射程之內。

最後，中共的言行作為若有不符或違反國際法之處，中共常引用「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來規避其違法行為。例如，國際社會指控中共違反涉及香港的《中英聯合聲明》，但中共一律以「外國無權干涉中國內政」回應。未來，涉及臺海議題若對中共不利，中共也會以「中國內政」為由，拒絕國際法。

6. 所謂的臺獨

2021 年 2 月 23 日陸委會邱太三主委曾說：「兩岸交往幾十年，大家對某些名詞定義可能雞同鴨講，陸方的臺獨概念，在臺灣本來就眾說紛紜。他身為中華民國政府臺灣，堅持底線就是國家主權以及臺灣民主。不太清楚對岸對於『臺獨』的定義為何」？

邱主委是委婉的提醒中共，不要拿臺獨當藉口來分化打擊臺灣。中共把兩岸關係定性為統獨之爭，而非專制與民主的競爭，意圖掌握「臺獨」的詮釋權，製造臺獨帽子。對民進黨製造「法理臺獨」、「文化臺獨」、「柔性臺獨」與「切香腸式臺獨」等標籤；對國民黨製造「隱性臺獨」、「B 型臺獨」、「臺獨 B 貨」、「變相臺獨」與「暗獨」等標籤。只要不是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就是某種形式的臺獨。實際上，中共是臺獨帽子工廠，是最大的臺獨作手。

白皮書又出現「依法打擊臺獨頑固分子，有力震懾臺獨分裂勢力」、「挫敗一切臺獨分裂圖謀的根本力量，搞臺獨分裂抗拒統一」、「絕不為各種形式的臺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粉碎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等語句，所謂「一切臺獨分裂」、「各種形式的臺獨分裂」、「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等，都預示未來只要拒絕「一國兩制」統一方案的都是臺獨。

7. 所謂的臺獨清單

2021 年 11 月 24 日國臺辦點名行政院長蘇貞昌、立法院長游錫堃、外交部長吳釗燮為「臺獨頑固份子」，「挑動兩岸對立，破壞兩岸關係，圖謀分裂國家，危害臺海和平，我們依法對其實施懲戒」。不知中共是依據哪個標準擬定名單，造成臺灣很多人不滿，認為自己是臺獨卻不在名單內？中共也沒說依據哪一個法？一般會認為是「反分裂國家法」，問題是該法沒有相關的制裁規定。

這次白皮書出現「依法打擊『臺獨』頑固分子，有力震懾『臺獨』分裂勢力」之後，2022 年 8 月 16 日中共中央臺辦發言人授權宣佈公布：「蕭美琴、顧立雄、蔡其昌、柯建銘、林飛帆、陳椒華、王定宇等為列入清單的『臺獨』頑固分子，游錫堃擔任董事長的『臺灣民主基金會』的執行長、吳釗燮擔任董事長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的秘書長實施制裁，極力勾連外部勢力進行謀『獨』挑釁，蓄意挑動兩岸對立，肆意破壞臺海和平穩定，在佩洛西竄臺期間表現尤為惡劣，進一步暴露其冥頑不化的謀『獨』本性。今天公布的『臺獨』頑固分子名單，不是清單的全部。我們正告『臺獨』頑固分子必須懸崖勒馬，膽敢以身試法，必將遭受嚴厲懲罰」。

這裡所謂的「以身試法」，也不知道是哪個法律？但是，卻有明確的政治意涵，其一是把增進臺美關係、推動民主發展與推動國際合作，都列入「臺獨制裁」的範圍；其二是要求臺灣人民要跟臺獨分裂分子劃清界線，推進祖國統一進程。事情至此，就是強臺灣人之所難。按照這種標準，臺灣有99%以上是臺獨。不過，國臺辦的「禁止蘇貞昌、游錫堃、吳釗燮入境中國大陸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這項措施，就是自己證實了「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另外，所謂頑固份子原來是指國民黨「頑固派」，源於抗戰時期中共指國民黨存有「假抗日、真內戰」的意圖，而中共以「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統戰策略，2021 年 12 日 15 日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汪毅夫所寫：「臺灣問題與研究臺灣問題的立場」一文，認為「頑固堅持反共立場的國民黨頑固派，和死硬堅持『臺獨』主張的民進黨反動派，都是製造臺灣問題、妨礙解決臺灣問題、阻礙實現祖國統一的主要敵對力量，都要打擊」，而明確歸納出四種類別：

（1）堅持反共立場、破壞國共和談，挑起國共內戰。

（2）走「親美」路線，勾結美帝國主義。

（3）「繼續一黨專政」做假民主。

（4）反對「一國兩制」，最早將「一國兩制」汙名化。

結論是「我們不能傾向於國民黨頑固派或者民進黨反動派，而應該傾心傾力支持臺灣愛國統一力量」。因此，白皮書與臺獨清單都一樣，本質上是統戰作為，非法律作為。

鑒於中共是先宣布對美國歐洲等外國人與企業的制裁後，才在 2021 年 6 月 10 日制定實施《反外國制裁法》。因此，可以預測在不久的將來，中共也會依樣畫葫蘆，對臺灣提出新法律或施行細則之類的恐嚇工具。

8. 中共的法盲思想

觀察中共內部對涉臺法律的辯論內容，就普遍存在法盲思想。例如對《統一法》立法的爭辯與「武統論」及「和統論」的爭辯結合在一起，反對立法的人質疑立法就能解決這些問題嗎？主張立法的人則習慣性的把法律當

成政治工具，其立法理由除「震懾臺獨」之外，還要「為美國與國際社會劃紅線」。一般法治國家，例如美國國會的涉臺立法，本質上是在規範美國政府的作為，要求美國政府依法行政。中共的立法目的卻相反，想要規範不受其管轄的美國人或臺灣人。殊不知中共制定法律第一個受其規範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包括中共所有黨員，而第一個可能違法或失職的人，就是中共幹部。

又如海峽中線問題，不只是兩岸默契而已，它原先是美軍於 50 年代所劃設，目的是避免美、中兩軍的誤判而默契式的規範雙方行為，這類似某種的軍事互信措施，亦是一種「信心建立機制」，當面對美軍時，破壞它不見得對中共有利；另外，從今天美國所展現出來的印太戰略軍事姿態而言，海峽中線不只是臺灣海峽的中線，也具有美國太平洋防線第一島鏈的中線意涵，改變臺海中線現狀，等同於改變美國太平洋防線的現狀，因為中共對臺海的蠶食，目標是對太平洋的鯨吞。事實上，過去美國軍艦通過臺灣海峽最常用的理由是「顯示美國對印太地區自由開放的承諾。美國將繼續在任何國際法所允許的地方飛行、航行和運作」，到 2022 年才增加「符合國際法，在國際水域的例行航行」這句話。

（四）結論

臺灣人民不可能接受這種白皮書的霸道與謊言，如果中共強加推動這份白皮書，將使兩岸關係回到 1990 年之前的敵對緊張狀態，將讓臺灣人民視中共如流氓寇讎，視中國大陸如畏途，也讓臺灣政府的兩岸政策改弦更張，放棄交流合作，準備抵抗保衛家園。

九、中共操作「臺獨頑固分子」之觀察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吳建忠主稿

- **中共利用單邊作為虛張聲勢，宣稱依法嚴懲「臺獨頑固分子」屬政治表態，恫嚇臺灣、干擾民主政治的惡劣行徑，不僅非法無效還適得其反。**
- **中共利用臺獨名單分化國人，透過「規範擴散」企圖馴化國人，企圖設定議題製造危機。**

（一）前言

在宣布「對裴洛西及其直系親屬採取制裁措施」之後，中共中央臺辦發言人於 8 月 16 日授權發布 7 名列入清單的「臺獨頑固分子」，包括：我國駐美代表蕭美琴、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民進黨立委柯建銘、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飛帆、時代力量立委陳椒華、民進黨立委王定宇，會對該等人員實施制裁。中共指少數「臺獨」頑固分子為一己之私，極力勾連外部勢力進行謀獨挑釁，蓄意挑動兩岸對立，肆意破壞臺海和平穩定，指控他們在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來訪臺灣期間表現尤為惡劣。

過去已公布的名單成員還包括我國行政院長蘇貞昌、立法院長游錫堃、外交部長吳釗燮，制裁內容包括：禁止其本人及家屬進入中國大陸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限制其關聯機構與大陸有關組織、個人進行合作等。

（二）中共操作「清單」制裁的政治邏輯

2020 年 11 月香港「大公報」、「文匯報」率先引用「權威渠道」消息稱，中共正在擬定一份「臺獨頑固分子清單」，隨後國臺辦也證實。到了 2021 年 5 月，國臺辦直接點名我國外長吳釗燮是臺獨頑固分子，並宣稱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嚴懲，並依「反分裂國家法」、「刑法」及「國家安全法」以繩之以法且終身追責。

從放出風聲到核實傳聞，中共極權體制考驗臺灣民間與政府的耐受力。中共從宣稱反對臺獨，到遏制臺獨，最後提出有意願、有能力、有信心挫敗

臺獨及粉碎臺獨，反獨力度加大，不斷擴大臺獨定義，這次中共公布裁制名單是預料之內，當事人多一笑置之。

中共過去一般都是用軍事演習、經濟制裁等方式來威嚇臺灣，為了表達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等人到訪臺灣的不滿，更採取點名批判方式。有關制裁沒有實際影響，這些法律主張只屬於政治表態。當前兩岸關係的進程中，闡明了中共政治邏輯的「敵我」定性，追求釜底抽薪的法律之策。

眾所周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2020 年底發表講話指要以法律手段捍衛中國的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2021 年 3 月，全國人大年度工作報告中表示，要圍繞「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長臂管轄」等，升級中國法律 「工具箱」。從學理來看，中共對外政策區分為「說服」、「脅迫」、「控制」等 3 類主要策略，而其中「脅迫」策略之運用，分別扮演「主要核心工具」和「輔助支援工具」之功能角色，「脅迫」的成功與否，決定於執行時「脅迫成功要素」是否完備。

除了點名批判的「脅迫」外，中共透過國務院臺灣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來指控，臺灣民主基金會及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是臺獨份子的關聯機構，打著民主、合作發展的旗號，在國際從事分裂中國的活動，拉攏反華勢力攻擊抹黑中國大陸等。中共當局已經禁止陸方組織、企業和個人與兩家基金會合作，也禁止與捐助兩家基金會的 4 間臺灣企業進行任何交易和合作，並且禁止相關負責人入境中國大陸。

中共列出這份「清單」就是一個殺雞儆猴的邏輯，對於制裁的非對稱性明顯。從制裁手段來看，出入境以及相關活動，本來就是「主權行使」或「邊境管制」常見的行動，沒有太多新意。「制裁」行動要看中共後續如何詮釋「限制其關聯機構與大陸有關組織、個人進行合作，絕不允許其關聯企業和金主在中國大陸謀利」的所謂「有關組織」、「關聯企業」。

（三）中共發布「清單」的意涵

在公布清單後，中共官媒「環球時報」一篇社評標題名為「一張懲戒『臺獨』的天網已經張開」，該文稱目前公布的措施可能只是「開胃菜」，

公開的 10 人也不是「清單」的全部，未來恐隨兩岸政治情勢緊張及關係惡化，會再陸續公布「清單」，產生威懾效應。這類「脅迫」行動不利於吸引臺商外資進行投資，或讓那些越來越感到在政治博弈中，將會被當作犧牲品的公司或投資人恢復信心。

進一步來看，這次「清單」有什麼實質意涵？外界普遍認為民進黨的政治獻金將因為「清單」受到影響，這部分也許在年底「九合一大選」後可以獲得比較討論。另外，根據中國大陸「刑事訴訟法」，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對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的「臺獨」頑固分子，可依法適用缺席審判程序。

中共宣稱依法嚴懲，這類恫嚇臺灣、干擾民主政治的惡劣行徑，只會與普世價值越離越遠。中共如果在乎「清單」會不會適得其反，就不會頒布「清單」；如果頒布了「清單」，就說明中共已經完全不在乎臺灣人反應，自信自己有能力使用制裁手段讓相關人等感到痛楚。這次「清單」追求的是冒頭就打的精確打擊，中共將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列為制裁黑名單，這是「清單」唯一一位參選人，意圖影響我國「九合一選舉」明確，企圖打壓蔡其昌及六都選情，製造寒蟬效應。

眾所周知，中共對在陸發展的「綠色臺商」判定標準收放自如，半點顏色不由臺商選擇，避免其在中國大陸生產經營謀取利益，卻以其利潤盈餘回臺支持臺獨的行動，如對激進獨派政黨及人士捐獻「政治獻金」。中共企圖用「清單」招喚「促統」力量，在國家主權和民族大義的大是大非面前，臺商臺企能分清大是大非，站穩立場，不再支持「臺獨」，便能得到中共一如既往的歡迎，不可以吃飯砸鍋。

「清單」除了想要精準打擊外，中共還希望「清單」產生「促統反獨」的新攻勢，拉攏支持「九二共識」政黨及支持兩岸和平發展民眾，共同「堅決抵制、反對臺獨分裂活動，與中國大陸同胞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一進程」。顯而易見，中共除了擴大對獨派人士、綠色臺商及非政府組織脅迫外，更想建立反獨促統的統一戰線，拉攏倡議「兩岸一家親」

的白色力量及支持「九二共識」泛藍政治聯盟，團結統派力量、拉攏中間派及打擊獨派，優先建立反獨聯盟陣線。